

海宁市档案局(馆)编

宋霭彬文集

第一卷

浙江省百项档案编研精品
海宁档案编研辑刊

中华书局

海宁市档案局(馆)编

宋雲彬文集

第一卷

王況華敬題



浙江省百项档案编研精品
海宁档案编研辑刊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宋云彬文集/海宁市档案局(馆)编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
2015.2

ISBN 978 - 7 - 101 - 10664 - 0

I. 宋… II. 海… III. 宋云彬(1897~1979) - 文集
IV. 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10311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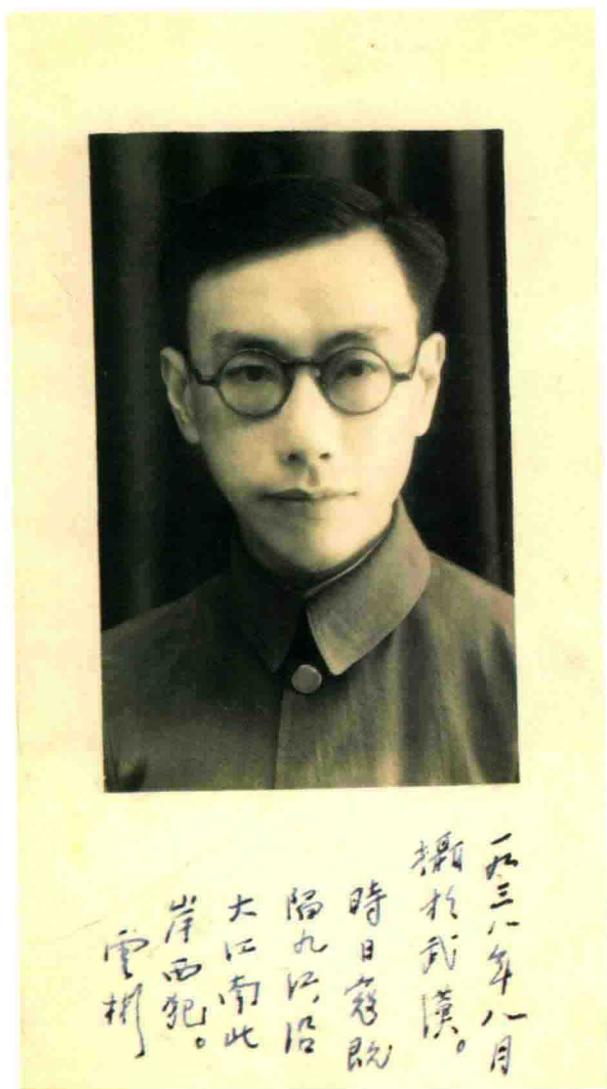
-
- 书 名 宋云彬文集(全五册)
编 者 海宁市档案局(馆)
责任编辑 俞国林 朱兆虎 李碧玉 刘 明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-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5年2月北京第1版
201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700×1000毫米 1/16
印张171 插页28 字数2400千字
- 印 数 1-1000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 - 7 - 101 - 10664 - 0
定 价 980.00元
-



宋云彬先生



与女儿宋蕴庄（1919年）



1938年8月摄于武汉，时在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作抗日宣传工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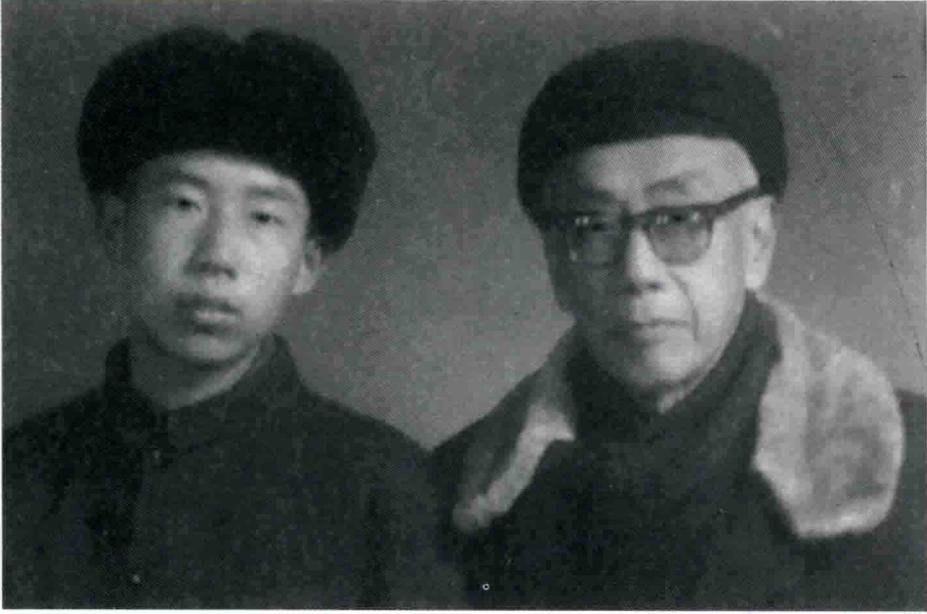


1946年秋在湖北石灰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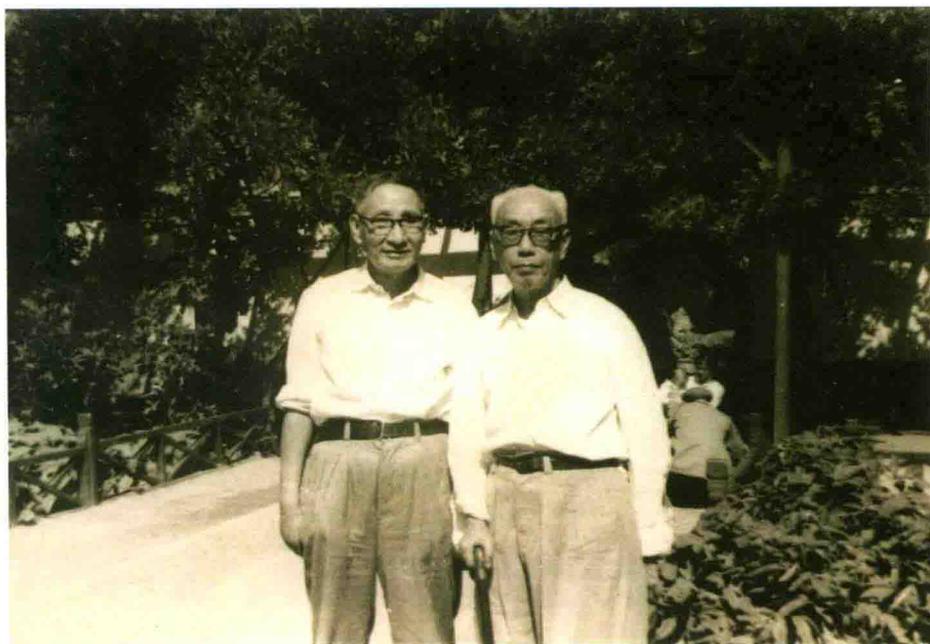
站立者右六为宋云彬，右九为女儿宋蕴庄，身前小女孩为外孙女李新，前蹲者右一为儿子宋剑行



1955年7月26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合影
第二排左四为宋云彬



1970年初与孙子宋京其摄于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



1972年9月与吴世昌合影



与陈翰笙（右四）等合影

《宋云彬文集》编辑委员会

顾 问 朱海英

主 编 沈虹星

副主编 郑红霞 徐炳林 崔金华

编 辑 虞坤林 宋京其 宋京毅 李 平

卢明华 吴佩剑 石晨阳 朱薇薇

文化苦旅六十年

——怀念宋云彬先生

俞筱尧

宋云彬(1897.8—1979.4)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化战士。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,他就已开始办报,朝着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个大方向努力奋斗,但在前进的道路上,付出了重大的代价,竟至抱憾以终。今年是他逝世35周年。

抨击社会黑暗

1897年8月16日,宋云彬生于浙江海宁硖石镇上的商人之家,自幼丧父,家道中落。少时他在镇上米业公会小学堂毕业后,到杭州宗文中学读了一个学期的书,后来又在杭州共和法政学校当了一年旁听生,便回到硖石。他祖母希望他能继承父业,然而他无意经商。当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,各地都办起了学堂,不再以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作为主要课程,但在国文课本中仍选入不少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和汉魏六朝以及唐宋时期的诗文。他在米业公会小学堂读书时,有位国文教师朱起凤(丹九),对宋云彬十分关心爱护。在朱起凤先生的诱导启发下,宋云彬对古文和中国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,并且为进一步阅读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宋云彬回家乡后,选择自己喜欢读的书认真阅读,晚间在床头点一支蜡烛,常常读书到深夜。

1919年爆发“五四”运动,使宋云彬接触到了新文化和新思想,《新青年》等杂志对他产生深刻的影响。1921年,他终于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老家,开始走上新的生活道路。从1921年11月到1924年夏,他先后在杭州担任《杭州报》、《浙江民报》、《新浙江报》的编辑、副刊编辑和主笔,常在这些报纸上发表杂文和社评,揭露社会黑暗,抨击军阀政府的腐败,很受读者的欢迎。也正因为这样,宋云彬成为浙江一带人民心目中的“激进派”。

北伐前后

1924年,宋云彬结识了时任中国共产党杭州支部书记的安体诚,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发生一个重大的转折。安体诚是中国共产党在浙江省的早期领导人,他了解宋云彬是一位思想进步又有正义感的青年知识分子,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积极发展组织,推进国共合作,很需要这样的人才。经安体诚多次启发,宋云彬逐步认识到只有打倒军阀,驱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,国家才能独立自强,老百姓才能摆脱贫穷落后过安宁的生活。这年8月,他由安体诚、宣中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国共合作之后,宋云彬奉命组建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,并筹组省属的各级党部。1924年下半年,杭县、萧山、鄞县、绍兴四个县临时党部相继成立,同时也向海宁、平湖、临海、永嘉等县派出了筹备员。宋云彬又被派为海宁县筹备员,他通过在海宁教育界有一定威望和影响的朱宇苍进行工作,进展很顺利。

暑假期间,宋云彬和朱宇苍、詹秉文等利用小学教员讲习会,负责宣讲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三大政策,以及打倒列强、打倒军阀、坚决废除不平等条约等革命道理,发展了一批党员。宋云彬还在硖石镇东山建立了第一个区分部,不久几个区的区分部和海宁县临时党部也都相继成立。

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兵变,拘禁贿选总统曹锟,电邀孙中山北上,共商国是。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发表《北上宣言》,号召举行国民会议。1925年4月国民党海宁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县城(今盐官镇)召开,海宁县党部宣告成立,宋云彬等9人被选任为执行委员。3月12日,孙中山在北京病故后,国民党内左右两派的斗争日趋表面化。国民党右派背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,公开反对国共合作。12月在宣中华主持下,宋云彬和担任嘉兴、杭县、绍兴、鄞县、永嘉、平湖等县党部执行委员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代表数十人,针对省党部“西山会议派”沈定一(玄庐)搞分裂活动,在硖石原海宁县硖石区党部所在地,召开“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”,号称“东山会议”,反对“西山会议派”的反动路线。“东山会议”代行临时省党部职权,在杭州头发巷15号设办事处,并于1926年3月正式成立国民党省党部。国民党右

派企图以上海、江苏、浙江三省为基础,在上海另设国民党(右派)中央,与广东国民党(左派)中央相对抗的阴谋,在浙江地区遭到挫败。

宋云彬在1924年秋开始担任党在上海创办的国民新闻社通讯员,1926年5月因社长邵季昂被捕,奉命前赴上海,接任社长。10月,该社被封。宋云彬奉调前往广州,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编纂股股长,编辑《黄埔日刊》,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领导下工作。他还和政治部总教官恽代英、教官萧楚女时相过从。他们的教育和影响,使他一生都难以忘怀。1927年4月北伐军攻克武汉,他又担任武汉《民国日报》编辑,兼任武汉政府劳工部秘书。但不久蒋介石、汪精卫相继叛变,宁汉合流,宋云彬名列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名单,他在武汉呆不下去,便经庐山牯岭潜回上海。

蛰居上海

宋云彬到上海后,党组织要他到海宁家乡举行暴动。他觉得在当时形势下,在海宁搞暴动没有把握,就这样脱离了党组织。之后,他蛰居在上海宝山路协隆里,不便外出公开活动。为了生活,经老友王伯祥介绍,担任了商务印书馆的馆外编辑。他用笔名宋佩苇为《国学基本丛书》编著了《东汉之宗教》(再版改名《东汉宗教史》)、《王守仁与明理学》、《明文学史》和《资治通鉴选注》等书籍,先后在1931年至1934年间出版。

1928年冬,宋云彬为开明书店编辑加工朱起凤编著的《辞通》。《辞通》是一部阐述古汉语音韵、通假、训诂的辞书。全书300万言,是作者花20年心血撰著而成的。著名学者章炳麟、胡适、钱玄同等见了原稿多交口称誉。但此书不但篇幅大,且偏僻字多,排版刻字成本高,照相影印又以原稿手迹笔画太细,不够清晰,且印数可能不会多,出版商怕亏本,故出版问题颇多周折。后商之于开明书店主持人章锡琛,章锡琛当时很想在出版业有一番作为,在王伯祥、叶圣陶、周予同和郑振铎等支持下,经考虑再三,并与夏丐尊商量后,决定接受出版。商请宋云彬担任编辑加工,周振甫等协助。宋云彬是作者在家乡米业公会小学堂读书时的入室弟子,师生关系较好,其编辑加工能力也为作者和章锡琛等所信任。以此缘由,宋云彬正式参加了开明书店。他认真从事,条目次序颇多调

整,由原来的72卷厘定成24卷。宋云彬在《辞通·跋》中说:“每遇疑难,辄商之先生,三四年来,往返函牍,亦几盈尺。”可见宋云彬编辑加工的辛勤。

《辞通》的出版,与商务印书馆《辞源》、中华书局《辞海》鼎足而三,使开明书店在出版界提高了声望。《辞通》在1934年初版第一次印刷,预约一万册,在两个月内销售一空。随着又续印了几万册,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

在开明书店,宋云彬还和夏丏尊、叶圣陶、陈望道合作编著《开明国文讲义》,和王伯祥合作编著《开明历史讲义》。后又为《开明中学生丛书》写了《陶渊明》、《玄奘》、《王阳明》等书籍。开明书店为青年读者编印了一套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洁本,其中《水浒传》的工作也是宋云彬做的。他还在《新少年》半月刊上陆续发表了《黥涉为王》、《朝仪》、《刘太公》等十余篇“故事新编”式的历史故事作品,后来结集编为《玄武门之变》,由开明书店于1937年出版。

从1930年12月到1937年8月,宋云彬已在开明书店工作七八年,充分展现他的国学根底和写作才能,也使他结识了一批著名文化人和老编辑。在1935年12月他还参加了沈钧儒等发起成立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,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政治的活动。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不久以团体会员资格加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,1946年在重庆改组为中国人民救国会,制定新的政治纲领,选举新的领导机构,宋云彬被推选为中央委员。

抗战初期在武汉

1937年“八一三”淞沪战起,宋云彬举家回到海宁。1938年4月辗转到达武汉,和沈雁冰、叶圣陶、楼适夷等在汉口创办《少年先锋》周刊。郭沫若任厅长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成立,他到三厅第五处二科担任科员,三厅是负责宣传的,五处分工动员,宋云彬主要起草文稿和宣传材料,同时也为一些报刊撰写杂文。

在团结抗日的旗帜下,大批著名学者和文化人都聚集在武汉政治部三厅,他们都不惜放弃各自原来较高的职位和优厚的待遇,屈尊俯就,这在国民党当局看来是不可思议的。他们看到三厅能网罗这么多人才,组成如此强大的阵容,既得意而又不免感到震惊。

和三厅成立几乎同时,阳翰笙、老舍等积极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(简称“文协”),得到重庆、成都、昆明、长沙、广州、桂林、香港等全国各地文艺工作者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。宋云彬也列为发起人之一。“文协”的发起旨趣是,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“团结起来,像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,用我们的笔,来发动民众,保卫祖国,粉碎寇敌,争取胜利”。“文协”还办起了会刊《抗日文艺》三日刊(后改为周刊、半月刊、月刊和不定期刊)。宋云彬担任了编委。这份刊物在武汉沦陷以后改在重庆继续出版,直到1946年“五四”在重庆终刊。八年内共出版77期,是国统区存在时间最长的进步文艺刊物。

“文协”成立以后,曾配合宣传和纪念活动,编印《武汉各界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特刊》、《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特辑》等,在《新华日报》和《抗战文艺》发表。《抗战文艺》一卷四期,发表了茅盾、郁达夫、老舍、冯乃超、胡风等18人《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》,指出他在北平参加日本侵略者策划的“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”的严重错误,希望他“幡然悔悟,急速离平,问道南来,参加抗敌建国工作”。但是周作人不但没有听从朋友们的忠告,而且越滑越远。宋云彬在《抗战文艺》等报刊上也发表了《从学鲜卑语讲起》、《杂谈两则》和《杂谈三则》等杂文,对周作人的行为进行斥责。在《杂谈三则》之一《呵周》一文中,宋云彬首先肯定了周作人对我国新文艺的贡献,并指出有人以“苦雨斋主”比“五柳先生”,周作人也沾沾自喜,还标榜自己的“言志”文学是真正的文学。宋云彬接着指出:

卢沟桥的炮声,惊醒了一切醉生梦死的中国人,然而我们的“苦雨斋主”却仍从容不迫地在他的“寒斋”里吃“苦茶”!邻居的无线电收音机,可以使他为了俗曲俚歌的刺耳而失眠,“皇军”的飞机大炮声,却可以使他安闲地聆赏。平津沦陷了,他还不肯离开他的第二故乡北平,又不肯跑出他的“苦雨斋”,去干点应该干的工作。于是关心他的、爱护他的朋友们都替他担心,怕他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。而果然,不久他就从“苦雨斋”跑到“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”去了。……处在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,除了做一个保卫民族的斗士或出卖民族的汉奸,还有夹缝可钻,还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吗?而况自从敌人把周作人参加的所谓“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”的记录